

习近平新时代观:理论之源、历史之脉及价值意蕴

杜仕菊, 程明月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勘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这一论断体现了深厚的理论思维、纵深的历史脉络以及鲜明的价值意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秉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基础,立足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制定出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时代方略。习近平新时代观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和人类社会规律三个维度上实现了新的发展。在当前中国处于“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关键时期,探析习近平新时代观对于深入理解时代发展动力、分析时代问题的方法以及时代变革的领导力量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习近平;时代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2-0018-08

XI Jinping's Outlook of the New Era: the Theoretical Source, Historical Vein and Value Implication

DU Shiju, CHENG Mingyue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identified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thesis embodies the profound theoretical thinking, deep historical vein and the distinct value implication. I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s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formulates an era strategy that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society. XI Jinping's view of new era has realized the new development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narrativ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narrative of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intersec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XI Jinping's view of the new era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times, the method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he

收稿日期:2019-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编号:15ZDC007);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新时代的哲学意涵”(编号:18JF046);2019年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中国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编号:ZY2019-YJ14)

作者简介:杜仕菊(1964-),女,浙江宁波人,法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文明与现代化等。

程明月(1994-),女,河南平顶山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times and the leading forces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MAO Zedong; XI Jinping; view of the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内蕴时代发展的科学规律与对人类关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找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勘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这一论断体现了深厚的理论思维、纵深的历史脉络以及鲜明的价值意蕴。

一、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指导框架

勘定中国发展所处的时代坐标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执政方略的首要前提,也是一切理论问题的研究起点。尽管历史的时空坐标已发生重大转换,习近平对时代的判定依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分析方法、核心主张和价值立场。因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以社会形态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对历史进行分期,其中内蕴时代发展的科学规律与对人类发展的价值关怀。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分析方法

《国际政治大辞典》对时代的定义为:“依据某些特征为界标,划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1](p44)}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中外思想家将社会历史分为不同时代。如黑格尔作为西方思想史上辩证法的集大成者,按照绝对精神的发展阶段,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和日耳曼的共四种王国。^{[2](p405)}中国近代晚清时期,康有为借用《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据乱世”“生平世”和“太平世”,其中“太平世”作为人类对未来的愿景,带有共产主义色彩。而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区别以上时代观的根本不同在于其划分方法建立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划分了“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3](p104)}在此之前,黑格尔所言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通过自我运动来显现的完满状态。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作为“创造性和否定性原则”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找到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动力,动力的实现根源于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历史的本质是一定客观物质条件下人民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而人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与客观物质条件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p470-471)}历史作为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活动的结果,个人在自然物质过程中也生产出物质化的社会关系,竖立在生产关系总和之上的是政治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而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占据相应的地位。

某一历史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决定了时代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衰落的条件是该阶级所主导的生产方式丧失自身全部优势。马克思所生活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来临得益于以下条件: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促成封建时代的解体。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结果,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激活了人的理性,在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逐渐“祛魅”之时,伴随着图腾式的自然被解码而来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以资本和科学技术为联姻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不断逐利的本质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的劳动方式逐步建立雄厚的工业资本,展现出新兴生产力的磅礴后劲,整个世界的物质力量即是人自身理性这一本质的对象化展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已作出阐释:“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p34)}其次,资本所内在包含的世界市场的趋势为自身扩张铺设道路。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必然具有从经济基础脱域至上层建筑的要求,因而资本主义在追求全球扩张之时,也要为其他民族锻造出相应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文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

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4](p35)}随着范围的扩大和条件的便利,各民族之间出现“同质化”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货币,更包含政治哲学等价值体系的输出。因而,在此文明内部所容纳的生产力未全部发挥作用以前,资本主义的时代性质暂不发生改变。

(二)两个必然: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主张

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大的历史时代”,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判断,其核心主张体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论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p43)}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深刻性在于其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去了。他不仅对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的来临做出高度赞扬,而且又借助作为否定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对现代社会进行剖析并试图对其重建,马克思与他之前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有着自身的历史界限,因而其所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蕴含人类解放的美好愿景。

“两个必然”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绝非一种“自动转化论”,^{[5](p64)}需要以“两个决不会”作为前提条件,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p592)}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关系,如果能够吸纳新的生产力并使之成为自身的权力载体,那么资产阶级的时代性质仍未发生改变;而当某种新的生产力在旧的社会结构中成熟为一种物质化力量,并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时,即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来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时代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早期资本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开辟殖民地以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由于其生产方式内蕴“资本和劳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自身在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必然为自身设限,这种限制即市场扩张不能满足生产扩张的要求,从而由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市场变成“异己”力量并逐步收缩。换言之,资本的内在矛盾使得当下资本主义面临资本的空间化困境,从而造成经济、政治危机以及文化冲突等在全球范围的爆发。

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该历史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也可将时代主题看作世界范围内主要矛盾的焦点。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时代划分为殖民开拓时期、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基础上将自己生活的时期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由于调整内部危机而显现出不同特征,但这并不妨碍新的社会形态来临的可能性,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位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6](p460)}共产主义正是一种全部人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组织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在于从旧社会胎胞中获取自身的物质化力量,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7](p182)}

(三)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不仅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规律,更立足“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从而将对规律的认识与革命化运动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实现落实在对“无产阶级”概念的分析上。

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在英国、法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发育时,德国仍处于教会国家的格局之中,关怀社会现实的马克思渴望为德国找到一个现代性发育方案。这个方案的深刻之处在于既要融入当时资本主义大的时代之中,又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建构。作为“理论武器”的马克思哲学区别于旧哲学最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现实的人”,通过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异化分析丧失人的类本质的原因,并在把握市民社会总体结构基础上找到建构“人类社会”的方案。无产阶级作为从市民社会产生然而又不属于市民社会的阶级,其所面临的不公

正是“一般的不公正”,因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并在解放全人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解放。

“人的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崭新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实现,解放作为一种历史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p527)}“革命的实践”是达到这一目的唯一途径。可从两方面来理解“革命的实践”:首先,马克思将黑格尔“纯粹活动”的历史性原则嵌入到“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从而确立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根基,这是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所在。思维以及理论的产生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检验其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应当放入实践之中。马克思指出:“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现实生活过程。”^{[4](p525)}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力量。其次,马克思世界观的哲学革命在政治上的要求是成为共产主义者,“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旧哲学对资本主义采取无批判和非历史性的态度,因而其存在具有天然合理性。马克思借助“革命的实践”将对“天国的批判”降至“人间”,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史、货币史、交换史和交往史的不合理性,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才得以实现。

二、历史之脉:习近平新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中国的当代表达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作为一种无批判的原则强加到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当中,只有立足于现实才能将社会实存作为思想所把握的内容。在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习近平新时代观,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真正发挥了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理论框架的把握,也是对历代领导人时代观内容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逻辑绝非静态验证,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实践发展走向未来的有力证明。

(一)对世界形势的认知视角:两种制度的关系从“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变化

马克思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仍是21世纪的时代底色,与此同时,习近平结合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新的变化特点也做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论断。可以说,两种制度的发展不断冲破固有世界体系格局的藩篱,因而相比毛泽东时期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新时代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面临自身弊端变革和调整的时代,另一方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并找到现实存在的时代。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叙事逻辑来看,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践,也标识一个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开辟的新纪元。20世纪的资本主义展现出更为迅速的发展以及更不平衡的新特点,从而进入到列宁指称的“帝国主义阶段”,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自身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站。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8](p649)}同时开启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过渡。伴随着资本主义主导下单一格局的松动,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不能全盘接收十月革命的经验,换言之,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区分之后,认识到其内蕴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定向,可以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20世纪后三十年,资本主义的上升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危机形成对比,福山一方面宣告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的建制中得以完成,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邓小平结合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实践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做出分析,将暂时的“复辟”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用改革开放的实践力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衰败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可见一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的蹄疾步稳展现出新的世界历史的可能性。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历史方位是习近平结合世界局势所做的判断,是建立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未变的基础上,因而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到新发展样态的注脚,而绝非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存在。依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以及历代领导人对时代性质的判定,习近平放眼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格局,指出当今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言明的时代,其本质仍处于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呈现“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资本主义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凯歌猛进之时,也不断通过政策调整以应对全球性危机的频发;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则彰显不同制度共存,以及新的世界历史局面开启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虽然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力量,同时由于其内蕴的否定性也是制造落后力量。资本通过全球扩张将其他民族地区纳入自身霸权体系,并使其沦为附庸,这就注定那试图通过复制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民族愿望落空。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世界上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这一事实印证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并未过时。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世界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频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了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层面上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二) 民族历史演进的视角: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观不仅继承了历代领导人对时代性质的认知,并以纵深的历史视角把握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与此同时,民族复兴的任务在不同时代主题之下也历经变迁。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曾屹立世界之林,有着民族共同体这一深厚的历史积淀。现代化进程强势将世界各民族纳入殖民体系之中,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中华民族的国门,更使其丧失作为社会心理基础的民族自信,由盛转衰的发展脉络决定中华民族母体中天然蕴含民族复兴的渴望。“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9](p32)}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国际六大最早表述“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观,并指出“采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途径去解决这项任务”;^{[10](p49)}“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11](p680)}主题规定中国当时要通过革命斗争来实现民族独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为日后中国“富起来”奠定政治基础。随着以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的分化与世界格局的重组,20世纪70年代“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发生新的转换。邓小平围绕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紧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使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日益完善推动经济领域内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外交层面上所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也为中国发展争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

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天然包括社会主义的复兴,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为全人类作贡献的能力的强大,非传统政治秩序中“国强必霸”。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横向的国际视野比较,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率超过30%,可以说“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13](p36-37)}从纵向的社会发展来看,新中国初期建立的工业体系发展到今天“五位一体”的社会布局,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开放多元,新时代比任何时期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国内民族复兴的大局作为总牵引,要求强起来的中国在时代主题转换背景之下制定新的外交方针政策,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来保障中国发展。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依据曾在新中国初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赢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如果说20世纪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那么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一种必然性选择。21世纪资本主义爆发的“黑天鹅”事件不仅使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面临重组,更使人类迈入“风险社会”,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终被淘汰,以“和合”为基础追求利益的最优化实现是最终目标,即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和人的进步相协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融通国际与国内、世界与中国局势思维的倡议,对于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破解时代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十九大提及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是对中国致力于为全人类谋复兴的生动表达。

(三) 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时代方略从“四个现代化”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价值立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矛盾运动的结果,对矛盾的解决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的本质是个人在一定客观物质条件下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

过程,因而不同时期内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与客观物质条件的矛盾制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历代领导人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治国理政总的牵引方法,从而制定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目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赞扬是由于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这种必要性是指共产主义的构建与资本主义被扬弃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换言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新需要的产生作为自身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生产力的绝对落后是社会发 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共八大将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从毛泽东最初提出的“国家工业化”到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直至最后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都旨在扭转农业国的落后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现代性在中国的发育不仅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而且极大地刺激了人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在此条件下,旧有的生产力发展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需要,此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p212)}邓小平不仅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且强调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以期实现人的协调发展,擘画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宏伟蓝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判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有助于执政党找准问题的症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新时代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定位更加高远。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已调整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使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增长,但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是囊括物质、生态、文化和人自身等层面的系统,这就要求社会发展必须实现从“单一生产”向“全面生产”的过渡;另一方面,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多来源于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之外的求真、求善和求美的需要,例如对民主政治、生态文明、社会和谐以及安全正义的要求,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在1960—2008年间,世界上101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归根到底在于其发展的现代化从属于资本主义权力内控的体系,因而实现的是一种单向度的现代化。习近平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通过扫清城乡差距、群众就业、养老医疗以及环境保护等制约人全面发展的障碍,以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本质差别,在此层面上说,中国正从“赶上时代”朝着“引领时代”的目标而不断前进。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观认为当今世界虽然仍处于马克思所言说的时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新的变化使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新的方案。可以说,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方法论、核心观点以及价值旨归的继承,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观在科学社会主义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以及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三者内容要素上的赓续发展。

三、时代引领:习近平新时代观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新时代观内容体系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纵深的历史脉络,它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勘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坐标,并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是在辩证考量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基础上做出的总体性研判。不仅精准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变化,又将中国发展嵌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致力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观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 把握时代变迁的根本动力,始终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强调了时代的更替根本上是由生产力所推动实现的,然而发展生产力的策略需要因时而变,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15](p91)}生产力作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目的在于生产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包括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生产、人的生产和社会生产四种生产形态。由于劳动所具有的二重

性,人在实践活动中也同时生产出相应的社会关系,可以说,社会关系依附于自然物质过程而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进步推动旧有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作为配置资源的私有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资本主义的内在否定性也决定其必将被更高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其条件就是“两个决不会”。随着资本贪婪吸吮自然界的自然力以实现增殖目的之时,一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如生态环境)由于其无法增殖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违背,这就呼吁一种代表人民的权力体系的出现。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不得不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效与问题并存。工具色彩占据主导地位而挤压人的发展空间,必定会出现个人畸形发展的局面,表现在精神领域则是消费观念的异化,表现在生态领域则是环境资源的破坏等,因而这种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欲望显然不符合新时代社会建设的要求。“新时代之‘新’,‘新’在我国由富变强的转折关头。”^[16]随着我国进入“强起来”的阶段,片面物质生产的方式必然会被历史淘汰,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涵盖的五种生产形态是今后社会发展所要致力实现的目标。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水平也不能仅用经济指标来衡量,2050年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的乃是全方位的社会与人的协调发展,这与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生产目的有着本质不同。

(二) 掌握研究时代问题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7]尽管当前资本主义由于新兴科技方式的助推展现出新的生命力,但其追求扩张的本性并未改变,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新型的世界秩序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正是深入到对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追问中,确立实践原则作为检验一切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从而以科学理论来指导人的生活实践过程,这也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在抓住作为“创造性和否定性原则”的辩证法时,马克思深刻理解了“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质,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矛盾,揭示市民社会的本质。但马克思并不止步于解释世界,更要构筑一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达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实践观”所包含的改造世界的一面。资本主义曾作为引领世界历史进步的力量,在地域上将各个分散和独立的民族作为自身的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并为后发国家迈入现代化轨道提供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种世界历史局面的持存;相反,资本增殖的意志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决定资本主导下世界历史的异化,其中“资本与劳动”作为本质矛盾无法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洞悉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向世界贡献出“中国方案”:在着眼自身发展的同时旨在解决各民族国家加快发展和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方案”的提出不是一种抽象精神的思辨,而是紧紧立足中国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变动的社会、经济结构。换言之,决不能为资本主义所展现的“繁荣”表象所遮蔽,而应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上来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开辟道路。

(三) 深刻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地位,新时代持续推进“伟大工程”建设

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是统一的,因而新时代的判定既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新变化的勘定,也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即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8](p62)}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代表全人类最广大的利益是其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强调阶级关系的变化,例如列宁认为占据时代中心的阶级应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从欧洲工人运动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种跨血缘核心力量的出现得益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其执政地位得以稳固的逻辑前提在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破解时代命题:建立政权、积累财富以及实现社会形态的整体变迁,归根到底都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设条件。“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必须对坚持党的领导形成高度的思想认同和坚定的实践支持。”^[19]

西方看似自由竞争的民主政体其实质是资本权力转向政治权力的转换器,资本自身不断追求增殖的意志外溢到政治领域中,从而引发更多的政治上的冲突,这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不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以金融资本吞并民生福祉为前提,被剥夺民生利益的国家只能取得泡沫式增长,因而不出现逆世界历史潮流的趋势。在世界局势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意味着时代转型对其执政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出新的要求,更意味着其所面临着“伟大斗争”的严峻考验。所以,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20]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若此才能大踏步地走在时代前列。

参考文献:

- [1] 刘金质,梁守德,等. 国际政治大辞典[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2]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 扬,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李 健,李 冉. 世界历史视野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3):64.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10] 戴隆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5卷)[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 求是,2019,(7):5.
- [13]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版)[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14]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5]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郝宇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治议题提出的理由[J]. 行政论坛,2019,(5):39.
- [17]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求是,2019,(1):5.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 齐卫平. 认识新中国70年发展史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8.
- [20]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N]. 人民日报,2019-01-12(1).

(责任编辑:郭荣华)